

的笼子，然后再搬上货车，运回报恩寺。

直到2016年，与有关部门商量后，一些被管制的流浪动物，可以由报恩寺接收。随着每次几十上百只地往回救，报恩寺实在安顿不下了，我便向亲戚朋友借了一圈钱，在浦东租了一个一万多平方米的农业园，将其改造成毛孩子的居所。

就这样，报恩寺成了救助“中转站”，有疾病的、残疾的狗狗在这里治疗，多数健康的狗登记在册后，统一运往40多公里外的浦东流浪狗基地。

每月缺口75吨，却从未公开募捐

救不完的是流浪动物，渡不了的是人。在我救助的流浪动物里，大多数是遭人遗弃的宠物猫狗，有些甚至遭受过非人般的虐待——被割断脚筋，被人砍得血肉模糊，被烫成重度伤残。

2000年时，我和义工们一次救下129只狗狗，其中很多被人打得眼珠脱落、牙齿掉光、断胳膊断腿，最可怜的小狗长了个拳头大的恶性肿瘤，在角落呜咽着。

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只叫悦悦的狗，全身烫伤，皮肉已经碳化溃烂，治疗了四个月才算康复。还有些流浪狗，一直在外流浪，抓捕回来吓破了胆，怎么也哄不出笼子，只能拽着它的两条腿用力拉出笼，这时倒挂着的流浪狗，会卷曲身子冲着抓住它后腿的手咬过去。我理解它们的恐惧与无助，也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。

基地目前有六个大棚，每个大棚2000多平方米，可容纳一千多只狗。按照体型大小、公母分开，一半室内一半室外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。平日里有工人和志愿者按时打理、养护，

报恩寺是救助“中转站”，智祥会把流浪动物统一运往浦东基地。



疫情期间，就全靠我一个人了。

为了让每只毛孩吃饱，为了节约成本，我亲手做了一批自动喂食器，放置在每个隔间。哪一个里面没了食物，马上加满，不限吃，人家都说我这边的流浪狗一个个养得像小猪一样。

1994年至今，或许出于自尊心或者其他考虑，我从没做过公开募捐，只接受主动捐款。但近一万只的狗狗，开销确实很大，除了每年的基地租金198万元，还要负担食物的供给。目前，每个月的缺口是75吨狗粮。

疫情之前，过年那会，为了省钱，除了买一些高档的60多元一斤的狗粮，我还会去宠物食品公司购买临期粮或者低品质的狗粮，到不到期的无所谓，因为对于这么多狗来说，4吨的狗粮，三四天就吃完了。而高低品质的粮食混合一起，狗狗们不爱吃，一定程度上也能更长地撑一段日子。

我一直觉得，用自己的钱做救助，花多少与别人无关，如果用捐款，就要考虑，尽可能多救助一个动物。

领养难追踪，渡不了的是人

随着救助的猫狗越来越多，有人劝我开放领养，这样也可以减轻救助的负担，我也尝试过，但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，让我不再轻易做出领养的决定。

曾经有一个领养人，很诚恳地找到我说，希望能领养一只刚出生的小奶狗作为宠物，经过一番挑剔细选，他们带走了三只长得好看的狗，唯独留下了那只最难看的。等我后面回访时，却发现这些被领养的狗，不是死了就是丢了。反而那只被挑剩下的小奶狗“侥幸”活了下来。这种无所谓的态度，让我感到心寒。

而被领养的五六百只流浪狗里，我能回访到的只有130多只，后来有些人换了电话，后续的追踪更是无从谈起了。我时常在想，如果在基地，它们虽然被关在笼子里，但每天能吃口饱饭，至少能活着，绝大多数会在这个狗棚中过完这一生，这对它们而言，已经是最好的际遇了。

救助这件事，有时候就像捐款一样，任何一个人主动捐款是在行善积德，如果是他去求来的，或有某些交换条件，那就违背了捐款这一行为的本心与初衷。有人问，既然有这么多的误解、操劳与揪心的事情，以后有一天，会不会不再继续救助了。我想我不会，救助，是一种修行，世间所有东西再好，只是身外之物，唯有生命是最珍贵的。☑